

控制黨的深層調查，其結果甚值注意。美國南加州大學政治學系黑田安正，從政治力學的觀點，分析日本社區中政治參加的類型，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了比較科學的分析工具。統計數理研究所林知已夫及於木達三等八位專家，曾於一九五三·五八·及六三年舉行全國調查，追究十年來日本國民社會態度及政治意識之變化，把他們的調查結果概括的介紹，可以說大致上是趨向於近代的，合理主義的態度。譬如把日本國民的道德觀，分為「戰前型」和「戰後型」兩大類來分析，男性的道德觀比女性的更富於戰後色彩。就年齡上說，二十九歲以前的年輕人，多屬戰後型，五十歲以上的多屬戰前型；三十至四十歲的一代，乃是通到戰後與戰前的一支分水嶺。在地域上分析，廿萬人口以上的都市與十萬人口以下的都市，固有差別，而與鄉村的差別亦甚顯著。前者多屬戰後型，後者屬於戰前型，從學歷上分析，則僅有小學及初中卒業者，多屬戰前型，高中及大學卒業者多屬戰後型，中間，由初中至高中乃是一支分水嶺。（註廿一）

綜括上面四點分析，我們發現其中①由於男女差別者小，（戰前型二二對三四；戰後型二六對一六）；②由於年齡差別者大（戰前型一五對廿八，對三九；戰後型四〇對二一對一二）；③由於地域差別者低，（戰前型二一對二六對三二；戰後型二六對二三對五〇）；④由於學歷差別者大（戰前型五三對一四對一〇；戰後型八對三一對四三）（見表三）。換言之，愈是年輕而受高等教育都市男子，愈有戰後派傾向。愈是年長而教育程度低的農民，愈加保持戰前派的習慣和意識。（註廿二）

日本的兼業農家，多數是年齡較輕，受滿國民教育，而且在家庭中沒有財產繼承權的次男、三男（雖然戰後民法已將長子單獨繼承權修正，但因防止耕地分散，此一傳統仍繼續通行）。這些兼業的農家子弟。往來於「都鄙之間」（所謂都鄙，指城鄉之意），彷徨徘徊，他們必須找尋兼業，以維個人生計或補貼家用，從他們出生到農家之後，即受傳統文化之薰陶，與古老風習之約束，決定了他們在家庭中比較劣勢的地位，也許由於此種特殊環境的影響，他們自幼養成了獨立自律的精神，比較他們的長兄更有近代人的性格。

美國學者阿培格林（James C. Abegglen）數年前赴日調查戰後勞動者的社會態度，其研究方法係從勞動者的「從屬性」與「自律性」（Subor-

戰後日本農民的分化與選票的移動

dition & Autonomy），來測定勞工階層的政治意識。他發現日本農家的次男，三男，轉業為都市勞動者，或至都市通勤兼業以後，他和都市生長的勞工，有同等的自律，獨立的精神，即重視實績主義（Achievement）的態度，而沒有一般理論上所認為的「歸屬主義」（Ascription）的態度。次男三男和他們的長兄相較，前者的自律性要比後者為高，阿培格林根據他的測驗，把兩者的商數寫成九五成·七%及八五·九%，兩者的性格差為九·八%。（註廿三）

如像西德一樣，日本的國民性格，如果依照「專農」兼農「現代產業勞工」的層次來分析，則愈接近都市，其近代個人中心的思想與行動也愈明顯。反過來說，愈與農業發生緊密的關係，愈到農村山莊，則其保守的態度，也愈濃厚，兼農介於兩者之間，也就是在傳統農業社會和現代產業社會的矛盾中間。李浦塞（S. M. Lipset）所稱的「邊緣人」（Marginal Man）也許可以用來代表他們的性格。在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兼農的比重與作用，究應如何估計，乃成為政策學上一個重要的問題。（註廿四）

將西德與日本比較言之，西德一般學者與政界，似對兼農的存在加以甚高之評價。過去一般評論家以為農家經營兼職。乃是對土地與資本的一種浪費，而西德學者則否定其說，認為「兼農」云者，乃是指那些持有土地，而同時兼營職工的農家，由於他們的食物自給自足，生活費比較都市為低，故扶養家族並無問題。同時，他們對都市商品市場和勞動市場，維持相對的獨立性，故對完全貧窮化的危機，具有抑止作用。由是言之，西德學者主張維持兼農，而不鼓勵其脫離農業，藉以促進農村都市和工業化的進程。（註廿五）

而日本的農業政策是要擴大農業經營規模，扶植自立農家，採用共同機械耕種的協業組織，同時為適應工業發展的人力需要，故計劃逐年減少農家戶數，轉移其人力於非農部門。在這種情形之下，兼農是否能獲得政策上的鼓勵與保護，仍有研究之餘地。一部份農業社會問題學者認為，當前的趨勢是促使富農成長；中農分化，小作農脫離，兼農轉為工資勞動者，而導致農村經濟的兩重構造，使農業的不平衡發展更為深刻，他們的預料似乎是悲觀的，因此他們分析當前日本農村人口外流，推原其故，由於農村貧困而排出（Push）人力者多，由於工業發達，工資吸引之力（Pull）者少。（註廿六）

六)。斯之持論，似乎失之偏頗。衡諸戰後日本經濟發展之速，以及都市產業人員所得之高（倍于農業人員），可知吸引之力仍然大于排出之力。

六 農民政治意識的構造

喬琪·加德林(George Catlin)認為政治即是研究政治權力過程的現象。哈羅德·拉斯威爾(Harald Lasswell)謂「權力即是參加決策」(註廿七)，戴維伊斯頓(David Easton)及勞勃·陶爾(Robert A. Dahl)以為政治的影響力量，可以從個人在決策過程中所扮的角色，來加以分析。柏森思與謝爾斯認為角色是指「行動者在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是，規定參加這過程的行動定向的組織化的部門」(註廿八)。簡言之。所謂政治行為即是足以影響他人決定政府活動的行為。(註廿九)。要分析某一地區的政治權力構造及階層間的政治影響力量，亦可以運用同一方法，從人民在政治決策過程中，他所扮演的角色，他所參加的程度，以及他所表現的態度來加以判明。艾琪爾及奧斯得朗(Rodent E. Agger and Vincent Ostrom)在其富有創建的小社會實驗研究中。提出了大項政治參與者的類型，此即「積極的顧問」，「消極的顧問」，「議論者」，「工作者」，「默從者」以及「不参加者」(或「超然者」——本文作者)。(註卅)。但是除此六者以外，我們還當了解實際從事政治活動與決定政策的權力階層，是不可忽視的，故在分析政治角色時，我們應當加上「領導者」一層，七個重要的人物類型，似乎是應該被考慮的。

追隨此項設計之後，美國南加州大學的黑田安正氏，曾經在東京附近一個有人口一萬六千餘人的地區，從事一項實驗性的調查研究，他從登記的有權選民冊中，每隔三十人抽出一個樣本。在總共三三二一個樣本中，他又參照卡茲與蒲萊德的「迂迴參與」的調查方法(Circuitous Participation)(註卅一)把日本地區社會的權力構造，作了一個類型分析。報告以為日本地方的選民中，多數可以列入「不参加」(Nonparticipation)的一類。除了正常的選舉投票以外，一般人民參加政治活動的，不過五分之一，這些活動份子大致可以歸類如左：

至六十四歲之間，已婚，受過高等教育，收入優，地位高，經常閱讀新聞，在地方住過至少三十年以上，或一輩子住在地方，他們沒有外遷之意，即使外面有機會，亦不欲出此，他們參加三個以上的團體，其父母熱心參加地方公共事務。他們都是自民黨員，思想有保守傾向。所有領導者均與地方首長及其他地方領袖有交往。

二、積極的顧問(Active advisors)——他們很多方面與領導者相似，受過高等教育，關心時事問題，參加二個或更多的團體，他們與地方首長及當地名流的接觸機會甚多，除領導者外，以他們為最多，其父母參與當地事務者，亦如領導者同樣的多。

但他們的興趣與前者不同。他們多為年輕人，雖然出生在地方，但都希望一有機會就遷移出去，因其中有很多是農民，他們渴望轉業。在這一階層中，社會黨的影響力量較大，而且他們都認為自己在政治上是有作用的，他們的政治責任感與市民意識亦較高，對政治現狀批評態度，富社交性，他們之中有很多是社會主義的同情者。

三、消極的顧問(Passive advisors)——大致上與第二類型並無大別，其收入稍低，對時勢問題的關心亦稍低，但比其餘四類更為關心，他們在地方居住時間比前者為短，但遷出的機會亦較少，他們與地方首長及名流交往的機會比其他四類為多，但有一例外：即默從者與地方首長的關係更為密切。

就其政治傾向來說，其半數都是中立派，而第二類的半數為社會黨，他們的政治責任感與市民意識不如前者，但比「不參與者」為高，他們對現實政治亦是抱批態度，但較前者缺少社交性。

四、議論者(The talkers)——其中包括較多的女性，他們受過高等教育，與第三類同樣的住在地方很久，但他們願意遷出，其中半數說他們一有機會就想遷移出去，而且有許多是農民。他們比「顧問」參加更多的團體，也許這是為了適應他們精神上的需要，但他們與地方首長及名流沒有太多交往。他們的父母不像顧問的父母那樣參加地方事務。

他們的半數都是自民黨同情者，但在思想上和顧問一樣的富有自由主義色彩，他們對政治的感覺與消極的顧問相同，但比較他們更有民族主義精神，既然他們被稱為議論者，可見他們俱富社交性。

1、領導者(Top Leaders)——所有領導者均為男性，年齡在四十五

五、默從者 (Listeners)——他們的教育程度低，不常閱報，其半數大致在四十五歲至六十四歲，已婚，這兩點他們與領導者相同，他們比消極的顧問更富社交性，比其他各集團的份子更易控制，對現實政治與政治家也沒有批評。

他們的政治態度是選擇自民黨，而且思想比前兩者更為保守，他們之中沒有一人是社會黨同情者。

六、工作者 (Workers)——這一類型的男性比女性多，關於教育、年齡、婚姻、收入、職業、讀報習慣、居住時間、遷移機會、父母參加地方事務等問題，他們和「不參加者」，沒有多大分別，與地方首長及名流的接觸，比不參加者為多。

他們的政治傾向是最保守，最富於民族主義精神，而且其支持自民黨的程度，僅次於領導者。他們對政治最沒有批評，其政治感覺的商數低於前述五者。

七、不參加者 (Nonparticipants)——他們與默從者及工作者有許多相似處，他們不但政治冷感，而且在社區的其他活動方面亦是陳外的，他們的政黨選擇與政治意識傾向保守主義，他們認為對地方政治是無能為力，而且沒有責任，使人驚異的是他們的民族主義意識並不很高。

總括地說，地方的權力構造是由那些社會地位較高的人，充當要職，但在他們之下存在着對現實政治不滿的一羣顧問和議論者；他們多數傾向社會黨，愛好交際，批評現狀，他們比領導者更年輕、更窮、更少教育。然後又出現了一羣默從者和工作者，他們對現狀是比較滿意的，而且循規蹈矩。在這些參加者之下，又存在着「不參加者」，他們游離於現實政治體制以外，追隨大勢以決定其行為。因此日本的政治可說是安定的、保守的。那些失望的「顧問」和「議論者」，在此情形下很難與風作浪。因為一方面他們無法影響上層領導者的意向；另一方面，他們又面對着一羣政治冷感的羣羣，而且後者的思想和意識，都是安於現狀，尊重傳統。對於那些革新思想的「顧問」而言，其惟一可能利用的機會，似乎在今後農業人口逐漸減少的過程中，轉變他們的政治意識和行為；非此，無法改變目前的體制。衡之日本歷史，他們過去從未嘗試過革命的經驗，今後恐怕亦不會輕意作此嘗試，除非她受到某種外力的影響，配合國內經濟社會混亂的形勢，而爆發起暴力

革命的不幸事實。但目前我們還看不出什麼跡象。(本文係在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補助下研究論文)

(註十三)參閱 Seymour M. Lipset, *Political man, Heinemann, (London, 1960)* chap VI

(註十四)山田政治，「選舉中所表現的政治意識」，載日本政治學會編

「政治意識の理論と調査」，(一九六五年，岩波書店)，頁一七八—二〇三。

島田大學山田教授曾于一九五九年十月四日開始，在同縣市町村地區先後舉行過五次調查，最近一次為一九六四年三月，即第三十四屆衆院選舉之後四個月，根據選舉人名簿，用任意抽樣法，抽出四四〇個樣本，然後以此為對象進行調查，本節係根據其調查報告之資料。

(註十五)前引書一九一

(註十六)升味準之輔「投票行動中之陳外」，一九六二年；

(註十七)山田，前引文二〇一

(註十八)依照中期經濟計劃的估計，農業每小時的報酬為七四日元，非農業為一六四日元。

(註十九)一九六五年數字為四九七%，參見前文。

(註二〇) G. Teives, *Der Nebener wehstandvirt Usw, 1952*

參閱松浦孝作，「日本資本主義と村落構造」，誠信書房，一九六三年，P 10 附註。

(註二一)鈴木達三，「國民性的研究」，載統計數理研究所彙報，第11卷第2號，一九六三—四，頁一〇五

(註二二)朝日新聞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社評「明治出生與昭和的世代」中，對於當前日本人民的思想觀念，會作如下的詳述：

明治出生的人常嘆這一代的青年人無知。

今年為明治維新的九十九週年。從明治經大正至昭和，近代日本人已經過了三代，三代的意見與思想似乎有隔世之感，有位評論家謂明治人與昭和人的生活有如「與外國同居」，他們互相講話需要借助于「日和辭典」。其言似誇大，而實亦近乎事實。

推算明治，大正與昭和三代的人口構成，明治時代出生的人口約佔一三

%，大正一五%，昭和七二%。大正時代出生的人口所以不多的原因，是由于這一時期短促的關係。

就三代人口的支配力而言，財界人物以明治人佔多數；政界亦彷彿如之；官僚階層中比較年輕，除大使公使以外，凡次官級以下者多數在大正時代出生。明治出生的一三%人口中。女性佔其半數，再除去退休及其他體弱者外，實際支配日本的不過五%，即五〇〇萬人。

大正出生的財界人物，組織了「大正會」，其勢力比較單薄，大正元年出生的人今年該是五十四歲，昭和元年出生的為四十歲，四十與五十的人，應該總是同代的人。故大正時代出生者亦不可謂昭和與明治兩代人的調整者，擔負了所謂「日和辭典」的任務。

問尊敬的是誰？據輿論調查，六十歲以上的人，認識偉大的人物是：明治天皇、二宮尊總、乃木希典。二十代的人則推野口英世、湯川秀樹、福澤諭吉。

昭和六年時代的壯丁，是明治四十四年生的人，今年為五十五歲，徵兵檢查時，問到「理想的生活態度」，其回答是：

表一

項	目	百	分	比
清潔正大的生活		三二	%	
爲了社會		二四	%	
爲了錢財		一九	%	
有趣味的生活		一二	%	
爲了名譽		九	%	
悠遊自在的生活		四	%	

表二

項	目	百	分	比
清潔正大的生活		二〇	%	
爲了社會		七	%	
爲了錢財		二〇	%	
有趣味的生活		二二	%	
爲了名譽		四	%	
悠遊自在的生活		二〇	%	

昭和39年「成人日」調查當前青年人的生活態度，其內容如下：

表三

項	目	百	分	比
有趣味的生活		五〇	%	
悠遊自在的生活		一七	%	
清潔正大的生活		一六	%	
爲了錢財		一〇	%	

爲了社會	二%
爲了名譽	二%

關於第二表，爲昭和39年對五十歲以前的日本人之生活態度調查。將上述三者並以觀之，戰前約佔五六%的人，其生活目標爲「清潔正大」「爲了社會」，到了戰後兩者減少一八%；相反地，「爲了趣味」及「悠遊自在」的生活者，戰前僅一六%，戰後一躍而爲六七%。誠然，戰後派的人爲自己本位，缺乏「社會公衆」的精神。至于第三表所示者，爲昭和六年當時年僅二十歲前後的人，在戰後對生活目標的變化，在「清潔正大」的項目下，由戰前的三二%降爲戰後的二〇%；在「爲了社會」的項目下，由二四%降爲七%；「爲了趣味」的項目下，由一二%增爲二二%，在「爲了悠遊自在的生活」項目下由四%增爲二〇%，其一般傾向與年輕人無異，可見由于時代的改變，無論二十或五十歲左右的人，其人生觀均已改變。根本的說，同一時代的人羣，其基本的價值觀，由于年齡而發生的本質上之差異，並不懸殊。同時，二十歲的人，無論在什麼時代，其本質都甚相似，所不同者僅其時代的色調而已。

十代的人在土味（自然之子）二十代的人有人味（觀念的人）；四十代的人有醫味，六十代的人有銅臭味。這種看法未嘗無理。

(註三三) James C. Abeglen,

Subordination and Autonomy attitudes of Japanese Workers,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eptember 1957

(註三四) Tiewes, op. city 參閱前引松浦・P 8

(註三五) 松浦，前引書，頁三

(註二六) 兼農之成爲社會問題，可以從下述統計趨勢中窺見：
根據自殺統計，農民之自殺率，如照年齡來分類。以二五——二九歲及五十歲以上者最爲顯著。如按職業來比較，農民自殺率僅次于失業者及建設業者，佔第三位；一九五五年的統計爲十萬人中佔三五·七人；一九六〇年爲三二人，農民中尤以第二種兼業者，自殺率較高，如下表所示。農民兼業率與自殺率的相關數爲〇·五七人，較之與失業率及犯罪率的相關係數爲高，而尤其第二種兼業率與自殺率的相關係數〇·六一，比較第一種兼業爲高，可見第二種兼業的農民們，雖其收入較豐，而其精神上仍甚苦悶，這或者是因爲他們以兼業爲主，接觸外部的機會較多，有的兼農係日常通勤于都市或郊區的薪階級及工資勞動者，因環境多變化，生活不安定，其傳統的價值觀念，不能適應現實的生活環境，遂使他們走上了自殺之路。

(註二七) Harold D. Lasswell, Power and societ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2 p. 75

(註二八) Talcott Parsons and Edward A. Shil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註二九) Yasunasa Kuroda, Political Role Attribution and Dynamics in a Japanese Community, i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Winter 1965, pp. 603-613

(註三十) Robert E. Agger and Vincent Ostrom,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a small community in Heinz Eulau Samuel J. Eldersveld and Morris Janowitz, eds, Political Behavior,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6.

(註三一) Fred E. Katz and Fern V. Pifer, "Circuitou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9, No. 4, 1964.